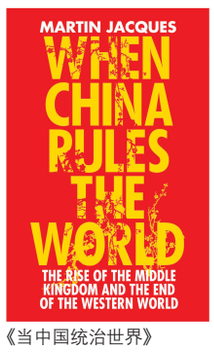
马丁·雅克　　受访者 / 供图

马丁·雅克：我只是开启了讨论

张琪 / 文

如果不是一次不幸让马丁·雅克失去挚爱的妻子而无法继续从事写作，这本名字叫做《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的书的到来至少还能早上 10 年。我们无法假设这样的一本书如果是在 10 年前，它的语气是否会和现在一样自信，结论是否会是同样的耸动视听，毕竟在 1996 年马丁雅克最初产生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的时候，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亚洲金融危机虽然近在眼前，但日本仍然是亚洲第一的经济强国；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已经进行了近 20 年，但直到 1992 年的中共十四大才正式确认了市场经济的地位，而当年的 GDP 还远远排在欧美国家甚至巴西之后；北京申办 2000 年奥运会的举动在走到蒙特卡洛的最后一刻遭遇失败；美国还没有出兵伊拉克从而在战争中暴露自己在军事能力上的局限；而那场据称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让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体系缺陷暴露无遗的金融危机的席卷而来，更是 12 年以后的 2008 年的事了。

马丁·雅克声称，与所有其他关于中国崛起的书，尤其是来自西方世界的作者们相比，《当中国统治世界》不仅仅是写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更多的是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国际关系、道德体系等角度论证中国在未来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在他看来，西方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分析仅仅着眼于经济方面，原因在于那些观察者们很难相信一直以来相对成功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最终会被完全不同的中国模式所取代。他们始终认为，西方式的现代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巅峰，是最完美的形式，所以，所有的社会，不管是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最终都会发展成西方式的现代社会。但马丁认为整个世界要比那有趣得多，人们应该看到那些已经出现了的新的“竞争的现代性”，它们和西方的现代性有着共同的地方，但也有着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现代化。而正像历史上曾经一一上演过的西班牙、英国、德国、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崛起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的控制力，也体现在文化和政治上渗透和影响力一样，中国作为一个在历史和文化上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主体，在未来的崛起更要复杂得多。



《当中国统治世界》

与中国的崛起相对应的，马丁·雅克指出，美国的衰落似乎是必然的。这个在 1945 年出生的英国人，一生都在目睹着英国从二战以后开始的整个衰退过程。而现在，马丁认为，美国人面对着同样巨大甚至更加富有戏剧性的现实和心理的转变。“我最担心的是，大部分的美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仅仅十年以前，前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当选还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人认为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美国时代’，然而这完全忽视和误解了那股潜伏着的趋势，直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才开始让部分的美国人认识到美国的权力正在从无限变为有限。”更为严重的是，相对于中美之间的此消彼长，英国的衰落看起来似乎更加容易让人接受，毕竟，曾经的老大哥只是把权力递交给了一个和自己有着共同历史、种族、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后起之秀，而中国，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以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思考的人来说，则是一个完全陌生和独特的他者，巨龙的苏醒仅仅听起来，就会让前者产生无尽的恐惧，更何况按照马丁·雅克的推演，拥有着庞大人口的中国一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整个国际秩序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争议由此产生。实际上，让马丁和他的书的批评者们无法认同的正是这一点。人们欣赏马丁的博学，欣赏他对中西方历史与文化差异的细致入微的体察，但是他们觉得他的这种挖掘只是一种相对静态和理论上的，中国确实是独特的，但它真的独特到了这样的地步吗？从来没有在中国长期生活过、仅仅做了几次学术访问又不懂中文的马丁·雅克是否看到或者说愿意承认一个更加现实的、民间的和变动不居着的中国？是否真的如他所说中国除了在工业革命和技术上借鉴了西方之外，其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一直以来都保持了纯正、统一、不可战胜和一成不变？再者，中美之间的竞争只是一场零和游戏么，中国的强大又怎么可能离开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而独立完成？更加致命的是，批评者们在马丁的论证中发现了大量逻辑上的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他总是在抛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之后又马上承认自己也不能确定，例如一方面他说“中国注定要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权力体……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用自己的经验去看待世界，当今的中国，一旦成为霸权力量，它们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去塑造世界”，但他又说，“未来半个世纪，中国似乎不可能具有很强的侵略性”、“未来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继续，中国会做个维持现状的大国”，然而最后，“中国的魁梧身躯会迫使世界其他地区基本上默许其行为方式”……对此，最糟糕的评价是：他讲的实在缺乏洞见、观察力，也无助于对现实的理解，看似正确的语言，拼在一起又形成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其间并无逻辑关系。

不管怎样，目前看来，中国的读者似乎并没有出于对书名的过度解读而大惊失色抑或妄自尊大，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马丁·雅克的书不仅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的独特视角，同时也让中国人自己开始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马丁·雅克

伦敦经济学院 IDEAS 中心（该中心主要研究国际事务、外交和宏伟战略等）高级客座研究员、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英国《卫报》和《新政治家》专栏作家

访谈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期间，什么事情对你影响最大？

马丁·雅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见到了很多人，有很多有趣的讨论，这些讨论对我非常有启发。2005 年至 2006 年间，我曾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访问教授三次访问该校，那期间有三个人对我影响最大：余永定、时殷弘、黄平。那些帮助我的人大多是学者，当然，不仅仅是学者。

实际上，我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于各个方面。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就经常来中国了，当时主要是上海，我到处旅行、观察，与不同的人们交流。作为记者，我采访过各种各样的人，通过观察、倾听，写了很多报道和分析文章。而当我的身份转变成一个学者的时候，对事物的理解则需要比记者深刻得多，我需要发展一些概念和想法，以此来向人们深入地解释一件事情，所以长时期以来，我也读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此外我还曾经尝试着去学中文，我能说一些中文，但不能读和写，从这一点来看我还存在很大的不足。

经济观察报：你的书出版后，你被问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你是如何回应质疑的？

马丁·雅克：我的书同时在很多国家出版，不同的国家，人们所问的问题确实会有不同的针对性，不可能所有国家的人都会如你期待去问一些完全同样的问题。中国读者的角度和东亚其他国家的读者就有很大的不同，更不用提西方读者。比如，在西方国家，很多人会觉得我在故意夸大中国的影响力，对于我所说的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他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关于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都被人为夸大了，不足为信。所以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我想刚刚过去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而且，要知道，由于地理上的距离，大多数西方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也不可能像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这样的东南亚或东北亚国家，能够亲身感受到中国的变化，对于一个没有踏出过欧洲的人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

即使是欧洲人和美国人，看法也有很大差异，尤其从书评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在英国，书评的观点五花八门。但是在美国，人们对这本书的态度要更严肃和较真。他们的评价大多非常糟糕，批评也很尖锐。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说，美国才是世界的老大，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崛起和挑战。英国在历史上也曾经是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是现在，它的影响力已经变弱了，但仍然有很多人不愿意面对，一旦有人提起，他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同样的，在美国，可能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话题，没有准备好接受自己国家的衰落，直到金融危机发生，人们才突然意识到情况的严重，但这也只是在最近两三年而已。

在亚洲国家，又是另外一种情形。比如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人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同样生活在亚洲，而且距离中国很近，他们能够亲身体验到中国的崛起，他们很清楚，我并不需要说服或向他们极力证明，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想问的问题就不是：你肯定么？为什么我要相信你？你是不是有些夸张？而是，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在崛起，但是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未来会怎样？

经济观察报：你为什么如此看好中国？中国人自己都很清楚，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严重的问题亟待解决。

马丁·雅克：当我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时，中国人对这本书的反应让我很震惊。人们对此书的出现非常敏感。很多人和我说：你真的很了解中国，作为一个西方人，你是如何做到的？还有一些人说，你的书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得说，这也许是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再好听不过的话了。

第二种比较常见的反应是，关于这本书的题目——当中国统治世界——人们会问，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说中国是一个霸权国家？中国将吞掉整个世界？很不幸，我认为这本书的中文名字翻译得不是很好。如果你用英文说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人们不会直接地从字面上去理解，他们不认为中国真的会去统治整个世界，而只是对中国将要变成一个有影响力国家这件事情的一个更加通俗和文学化的表达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说美国统治世界，也不是真的在说美国正在统治我们，我们的意思是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对于这本书，中国人的态度是：喂，你要小心，你这样说会让别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我们不希望别人那么想，我们也不想成为别人的威胁。我非常赞成他们的意见，我也能够理解，因为我的书根本就不是一本持中国威胁论的书，完全不是。你在书中也不可能找到那样的意思，除非你一开始就带着一种非常负面的态度去解读。

第三种反应就是你所说的，人们会说，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仍然很贫穷，仍然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我们仍然面临很多难题……所以，你是如何得出如此乐观的结论的？我认为这样的反应是非常好的，我会说，你是正确的，中国时刻不应该忘记它还存在的问题。要理解中国，不能仅仅去看北京、上海和一些内部的省份，这会导致错误和危险的结论。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要知道，中国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掉当前所有的问题，你仍然要考虑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未来将会发生什么？

下转 50 版

中国转轨中的制度建设及其未来风险

楼继伟 / 文

我在这里想论述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想讲讲中国转轨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制度变化；另外，我想和大家谈论一下未来。

首先，我认为，中国 30 年改革是十分成功的。为什么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我曾经写过，实际上我们是运用了现代经济学论述的其他国家包括我们自己国家制度上的一些优点。我们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些制度优点包括《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三点：宏观经济稳定，市场化以及对外开放。它们在中国的改革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体现。

当然，大家对市场化的理解，有非常多的不同，比如让价格机制起作用、私有化等等内容。我们的成功，实际上是因为没有搞大爆炸式改革。大爆炸式改革的做法有很多缺陷。《华盛顿共识》的三点制度优势要起作用，需要同时解决一系列制度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不可能同时解决。因为计划经济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经济，所有的信息都是自上而下流动的，而市场经济信息是横向流动的，我们会发现改革后的税收制度和过去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制度不一样，会发现我们的会计制度不一样，会发现我们过去缺乏民法，包括合同法等，这一系列变化都需要建立制度来保证，也都需要时间来完成。而通过大包大揽的方式是不可能建立这些制度的。

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为什么快速私有化是个灾难？大家可以看俄罗斯，俄罗斯经常被当作一个反例。当然前苏联拥有会计制度，但是在俄罗斯已经完成私有化 10 年之后，在那个会计制度之下，却连所有人权益的概念都没有。那么私有化的结果是，所有人权益都聚集到少数人手中去了。但在中国不一样。古

楼继伟　　PHOTOTEX/ 供图

典经济学有一个假设，即假设信息交易是无成本的，但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化以后，我们发现，信息的交易成本却是存在的。无成本假设不存在该怎么办？那就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从一个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过程过渡到一个横向的信息交易传递过程，必须建立一堆制度，包括合同法、会计制度等来保证信息传递和交易。中国 30 年改革，最基本来说就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改变了原来的信息交换方式，转向了市场经济横向的信息交换方式，并建立了一系列制度。我觉得这是和东欧一些国家不同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接下来是动力问题。古典经济学假定如果没有私有化，就没有动力。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首先如果改革使得每个人都受益，那么大家就会支持，全体人民都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30 年的改革，使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改进，哪怕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的底层，但是比起过去来说，生存状况也要强得多。这就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支持。其次，我们在传统的国有制之外，又迅速发展起其他所有制形式，包括私有制和外资。即便是国有制，也跟过去不一样了，国有企业都变成了上市公司，激励机制也和过去不一样了。还有，我们实现了地方分权，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激励，同时也降低了市场经济的信息交易成本等。这些都解决了动力问题。

现在要说到未来。我们还能够继续这样走下去吗？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持续吗？这是个大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持续的一个条件是，中国经过 30 年的改革，已经建立起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否则，我们不能解释我们为什么能够维持 30 年 10%的经济增速。但是下一步怎么办？中国现在面临非常多的矛盾，我想从几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个角度是需求角度。大家都说，今后中国经济要从依赖外需为主转向依靠内需为主。但是我要说，首先，中国经济从来是依靠内需为主的。我们是一个大国，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单纯依靠外需。接下来，过往中国经济确实依赖外部的需求、特别是贸易上的需求，我们需要转向更多的内部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要更多地增长，这种说法我也同意。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那就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中，投资的比例仍然应该比较高，而消费不会非常高。这是我们的人口结构决定的。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还很年轻，但是很快会老化。在人口相对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去投资去积累财富，如果现在主张过多地消费的话，再过 10 年，我们会面临困境，因为我们会发现整体人口结构已经老化，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过去说养儿防老，现在又不让养儿——现在的中国人只能依靠积累财富来防老，依靠投资。

另外，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消费增长的潜力。这个潜力的发挥在于制度的完善。第一是土地制度要适应更快的城市化；第二是社会保障制度要适应劳动力流动的现实，以更好地刺激消费。我们注意到，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这两点都讲到了，而且明确了过去不明确的说法。比如在城市化上，明确说了我们要怎样城市化；在社会保障制度上，明确讲我们已经完成了省级统筹，现在要比较快地向全国统筹过渡。这两点是我们动员消费的非常重要的制度。

还有一些制度也需要变革。比如我觉得地方分权模式得改。中国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但我认为在目前的分权模式下，不可能很好地实现和谐。现在是什么样的分权呢？全国的公务员中，只有不到 6%是中央公务员，而一般国家中，这个比例是 30%甚至更多。这个比例说明，大量的事务比如全国性的司法公正、资源的交换，还有环境的保护，本来应该由中央政府来负责，但目前我们是让地方政府来做的。我不相信中国在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上能够例外，因此这一点应该改。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完善的制度是我们的外汇管理，如何开放我们的资本账户是一个大问题。

下一步的改革我们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但是如果搞好了，会非常成功。过去的改革虽然很难，但还不是最难的。因为之前的改革问题基本上属于在计划经济之下如何解除政府束缚的问题，也就是说，原来的政府功能是个负数，我们逐渐要把这个负数减少；现在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政府功能要从减少负的方向，变成增加正的方向，政府要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的市场经济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的建设。

我觉得下一步的改革，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危险，是用短期的权衡代替长期的机制设计。比如说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比如说城市化应该怎么做，再比如资本账户应该如何开放。还有，我始终认为我们的财政和地方分权要有一个重新集权的过程。中国应该像个现代国家那样做，但是在重现集权的过程中又必须不影响市场经济。这几个制度的完善和变革都有一些短期利益的考量和长治久安的考虑之间的权衡。

不过，我们要认识到，改革和制度变迁就要是要妥协、要过渡，比如双轨制，比如各种实验，但是，重要的是，这些妥协、过渡和实验，最终都应收敛聚焦到一个远景目标。如果不能聚焦到一个长远的目标，那将会是我们最大的风险。总体来说，如果做得好，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有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我们的机会。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减少风险上贡献我们的力量。

（作者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本文为楼继伟先生在《比较》杂志、清华经管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研讨会上的演讲）